



文明俊彩 秦川华章

——陕西西安太平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市文物与考古研究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太平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太平村东侧。遗址周围地貌为河流冲积平原，地势开阔平坦，海拔约365米。在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牵头，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组成太平遗址联合考古队，自2021年3月起，对太平遗址开展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截至目前，已完成50余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探，累计发掘面积4600平方米。通过这些工作对太平遗址的认识有了一些初步的线索。

确认这是一处大型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聚落遗址，由东西并列的两个环壕构成，遗址面积不小于100万平方米，年代约为距今4150—3700年。西环壕清理了西南转角附近和东南转角部分，东环壕清理了东北转角部分。两座环壕体量接近，口部宽度15—20米，底部宽度约10米，深约5米。环壕大部分在生土上开挖修建而成，边界明显，保存完好。环壕不平坦，有连续的香肠节状凹坑，由此推测挖筑环壕的方法可能是先分坑挖坑，然后将相邻的坑连通最终形成壕沟。壕沟的南岸边缘均发现有土质土痕迹，残高0.2—1米，以增加环壕内外落差。靠近聚落的内侧岸面呈斜坡状，部分区域设有排水的缓坡平台；外侧岸面陡直，部分壁面有水平状水蚀凹槽，由此可知当时环壕内有水流，可能与自然河道相连接，起到防御、防洪、排涝及满足日常生活排水的重要作用。两侧壁面皆可见明显的纵向挖掘工具痕迹。壕沟在废弃后用土堆放生活垃圾的场所。壕沟内坡状分层堆积内出土了较多同时期的陶片、玉器残块、白灰面地坪残块、动物骨骼乃至人骨碎块。环壕体量巨大，修建过程极为复杂，反映出太平遗址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组织与公共资源调配能力。

遗址内发现居住建筑形式多样，包括地面式方形建筑、“吕”字形半地穴建筑、圆形深穴式建筑、使用土坯的窑洞式建筑，两个居室与一个院落的半地穴建筑组合，及一处可能与建筑相关的人工夯土台基等。F9为一处包含两个圆角方形的侧室及一个椭圆形院落的半地穴院落建筑。院落平面形状为椭圆形，壁面较光滑、陡直，部分墙壁有泥抹痕迹，底部平坦，有不连续的少量白灰面。东南部有二级生土踏步，应为院落出入口。后室平面形状为方形，门道向东，有三级生土踏步。房间中部有一处火烧圆形灶面，西南部有一较完整的龟甲，房间内还发现有三件红陶柱状陶器，分别位于房间西南角生土台上，正南部壁灶内，东南角内壁龛中。侧室平面近方形，门道向南，房间中部有一曲尺形烧土范围，中部有一处椭圆形火坑。发现夯土台基遗迹，由四处圆角方形的夯土组成。整体方向均为东南—西北走向，堆积均为黄褐色致密土夹杂大量料姜石，从剖面观察可见料姜石明显水平层分布，每层厚度约1—2厘米。推测这四座夯土可能为地面建筑的“房基”，但由于历史时期自然和人为原因，“房基”以上的部分不存，未见踩路面、门道、灶址等具体遗迹信息。在圆角方形夯土之间相邻的区域还有宽约1米的黄土分布。此处堆积土质更为致密、料姜石数量较少，亦为逐层夯筑而

成，应为房屋之间的“隔墙”。这些多种多样的建筑形式表明太平遗址先民拥有高超的建筑技术，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动性创造性。

遗址内发现了20座客省庄二期文化时期的墓葬。以竖穴土坑单人墓为主，另有部分灰坑、灰沟埋人现象。其中M5为竖穴土坑墓，破坏严重，仅存东半部。残存壁面、扩边较清晰，墓葬填土中有木质朽痕，可能与葬具有关。墓底葬一人，仅存头骨及椎骨朽痕，保存较差，墓内出土玉璧1枚，位于盆骨位置的右侧。墓葬中部接近人骨的填土范围内，有密集分布的红色颜料，尤其是玉璧下方的红色颜料最为明显。

M20为竖穴土坑墓，上部被破坏严重，仅存墓底，墓底中部葬一人，骨骼整体轮廓较完整，但保存状况较差，墓内出土玉环2枚，分别位于右侧腕部和右手下方。墓葬填土中发上两层黄色颜料，上层为黄色颜料，主要分布在墓主头部、双臂内侧及左侧股骨内侧，呈片状分布；下层为红色颜料，附着于全身骨骼之上及墓底部分区域，亦呈片状分布，墓葬上部的填土中还有零星红色颜料呈颗粒状分布。经测试分析，这些红色颜料为朱砂，白色颜料为纯净的方解石型碳酸钙，黄色颜料为方解石型碳酸钙混杂了土壤及土壤中有有机物形成。

除此之外还发现少量祭祀遗存，如H186上部埋葬玉石器，中部发现大量灰烬，底部埋埋大量动物骨骼，经鉴定包括狗、猪、羊、猛禽类和部分啮齿类动物。墓葬和祭祀遗存的发现，对了解太平遗址先民丧葬方式与礼仪、宗教信仰、精神文明提供了重要物质资料。

在各类遗迹内出土有丰富、年代特征鲜明的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和玉器遗物，为准确了解太平遗址的文化内涵和年代信息提供了科学依据。出土陶器几乎涵盖了所有客省庄二期文化中常见的器类和组合，主要有甗、鬲、盂、鬯、盆、尊、绳纹平底罐、喇叭口高领折肩篮纹罐、带塔式盖敛口折肩瓮、各类单耳罐（杯）、双耳罐、双大耳罐、三耳罐等，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文化内涵与性质。玉器包括有玉璜、玉璧、玉刀及玉璧芯和玉料等，反映出太平遗址应有一定的玉器加工操作链，表明太平遗址应有玉器作坊存在，并拥有了一定专业化程度的玉石器手工生产体系。卜骨形制规整，灼痕清晰可辨，是我国古代占卜祭祀传统的文化源头。叶形陶牌饰枝叶纹刻画精美，反映着先民原始审美和对自然世界的认知。出土的一件带柄的合瓦形陶铃为关中地区少见，是我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见证，同类器物在陶寺遗址和新砦遗址有所发现，显示出太平遗址应有一定的级别。

在各类遗迹中还浮选出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出土动物骨骼遗存主要有猪、羊、牛等家畜，也有鹿、中华圆田螺、河蚌等野生动物；植物遗存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大麦等。表明太平遗址先民采取了种植、采集、家畜饲养、渔猎等多种生业模式，为了解先民对自然资源开发，生态环境变迁和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特别是小麦的发现为了解小麦东传路线提供了明确的证据。

二里头都邑布局考古的新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自1959年以来，在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络，展示了“九宫格”式宏大格局。宫城居中心，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宫城区和祭祀区自南向北布设于“九宫格”中路，“九宫格”中路的的东西两侧分别是贵族居住和墓葬区。二里头都邑迄今虽未发现大型墓地，但多数墓葬的布局仍呈现出相对集中、分区片落的特征。同一个墓区集中分布、排列有序的墓葬当大体属于同一个家族。宫城区和官营作坊区外围发现有围墙。二里头都邑的手工业生产，存在着大规模作坊和小型加工地点两种形式。

根据各区发现的居住和墓葬的分布情况、7号墙与“井”字形道路的关系，我们曾推测：“井”字形道路网络形成的“九宫格”除宫城区和作坊区外，其他7个区域或为不同家族、群体的居住区和墓葬区；作坊区西侧新发现的墙垣Q7，很可能是作坊区以西网格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外围大型围垣设施的东垣；进而推测，除了宫城区、作坊区外围存在墙垣之外，“井”字形九宫格”其他网格的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外围也应存在墙垣围护。

主要收获

为逐步解决上述学术问题，2019年在“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开始发掘，后根据发现的道路和墙垣情况，扩大范围继续追寻主干道。在追寻主干道和其他发掘过程中，取得了一些重要收获。

中心区新发现主干道及其两侧墙垣，揭示二里头都邑为多网格式布局。

在“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的发掘中，首先发现了宫城区外围“井”字形主干道路的西南路口，路口处的南北向和东西向主干道宽度约18米；发现了2个区域围墙的拐角：作坊区围墙西北角、宫城以西区域围墙的东南角，拐角均呈直角；发现了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作坊区以西区域的东侧和北侧围墙，唯宫城西南角和作坊区以西区域围墙的东北角被东汉及以后的活动破坏而无存。

以“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的新发现为线索，沿宫城区南、北两侧的道路向东、西追寻，新发现宫城区南、北两侧的东西向道路向东、向西延伸，已分别达470余米、440余米，均超过宫城的东西宽度（295米左右），且继续向西延伸。据此，我们推测作坊区、宫城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宫西路向北延伸至少200余米，且继续向北延伸，道路东西宽约17米。紧邻道路的两侧多发现有与宫城城墙成一直线或平行的墙垣，墙垣的宽度约2米，与宫城城墙的宽度接近。祭祀区以西区域已发现其南侧、东侧的夯土墙，宫城以西的区域已发现北、东、南和北侧的墙垣以及东南拐角，作坊区以西的区域已发现北、东侧的墙垣。

新发现陶器、骨器、角器和疑似漆器加工坊，是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重要突破。

首次发现较丰富的制陶遗存，包括制陶工艺多个阶

段。在祭祀区以西300米左右处、遗址北缘西部，可能各存在一处制陶作坊，分别发现较大面积、较丰富的制陶有关遗存，包括存泥坑、泥坯、陶垫、修整工具、陶窑、烧土、炉渣、变形陶器、大量碎陶片等。

宫城西南角近百平方米范围内，发现大量有砸击、切割、磨制痕迹的动物肢骨、肋骨、牛角、鹿角等，包括骨、角器加工过程中多个环节，有原料、半成品和废料，有锥、铈、簪等成品。有的原料、半成品、成品成组出现。初步推测这里是二里头文化晚期一处加工骨器、角器的作坊。

新发现可能与漆器加工有关的遗存。在二里头都邑北缘西部发掘区发掘出土800多片外表带有红漆的陶片，仅其中一个灰坑即出土了近200片。这些带漆陶片多为陶器残片，一些残片内外壁、断茬见红漆，可能为盛装漆液的容器。

在祭祀区以西发现贵族居住、墓葬区以及非正常墓葬。

“井”字形道路划分的祭祀区以西网格中，揭露1座二里头文化中中型夯土基址和多座墓葬等遗存。夯土基址的院中发现多座同时期的墓葬，其中一座墓葬宽1.3米，出土有铜盂、铜爵和玉器较高规格遗物，较为重要。夯土基址南侧80余米处，发现多人乱葬墓和2座墓主被砍头、截肢的非正常墓葬，它们都随葬有陶器，表明墓主并非最低身份的人群。这些现象以往较少发现。

结语

新发现的道路及其两侧墙垣所揭示的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是二里头都邑布局探索的一项重大突破。

中心区的主干道路及其两侧的墙垣把二里头都邑划分为多个方正的网格区域，表明极可能已出现了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群合一的布局。这是二里头都邑布局考古中的一项重大突破。二里头都邑这样严谨、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手工业作坊的新发现、新突破，填补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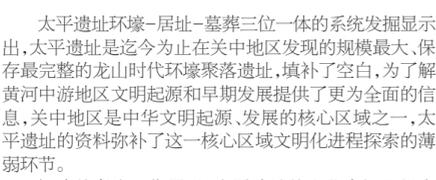
之前60多年，二里头遗址仅发现分布较零散的十余座陶窑、少量陶垫，对陶器加工坊及工艺流程了解较少；曾认定两处加工骨器、角器的作坊，但系早年发现，现场情况不明；发现的带漆陶片数量少且分布零散。新发现的带漆陶片数量为以往历年发掘出土带漆陶片总量的近20倍以上，实属罕见，提示遗址北缘西段可能存在制漆作坊。这些手工业作坊的新发现、新突破，填补了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空白，为探索这些作坊的分布、陶器、骨器、角器、漆器手工业的加工工艺、流程、特点、社会关系和社会分工等问题，进而研究二里头都邑手工业生产与二里头王国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骨、角器加工坊位于宫城西南角、1号基址近旁，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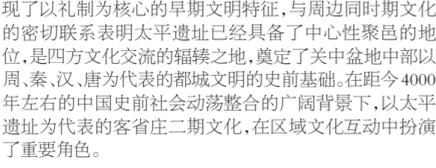
太平遗址发掘区概况



F9后室正射影像图



西环壕东南部正射影像图



玉器、玉璧芯、玉料组合



二里头都邑中心区西南路口的新发现航拍示意图



制陶遗存作坊的泥坑及存泥坑

具体年代、与1号基址的关系等问题，进而探讨当时的城市布局、规划理念和二里头文化最晚阶段的政权兴替等重要问题至关重要。

祭祀区以西的居住、墓葬资料的新发现，丰富了二里头都邑的内涵，深化了对该网格式区域的认识。

祭祀区以西夯土建筑、贵族墓葬共同出现，表明该区域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与以往在宫城区和其他区域的同类发现一样，再次证明了二里头文化盛行“居群合一”的布局形态，是龙山文化晚期“居群合一”布局形态在早期王国都城的强化和提升。乱葬等有暴力现象墓葬与夯土建筑和随葬有青铜容器的贵族墓葬同处一区，相距不远，表明该区域人群包括贵族、平民和更低身份的人员。这些重要的新发现，丰富了二里头都邑的内涵，有助于了解该区域的布局及历时性变化情况、自身特征、与其他区域的差别和联系和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关系等问题。

二里头都邑严格方正的都邑规划制度、宫城宫室制度、“居群合一”的布局结构，以及青铜礼乐制度等多种文化、政治制度和模式，被商周王朝继承，为商周文明奠定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并被后世延续发展，体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王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以及对商周文明的引领作用。同时，二里头都邑的这种布局，也为先秦时期其他都邑遗址探索布局、结构提供了有益参考。



陶铃



玉圭瓿



2022年发掘区航拍照片



大型墓M16出土铜礼器

西吴壁遗址位于山西省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南，以丰富的夏商冶铜遗存闻名于世。2022年7月至9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合作，在西吴壁遗址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东部（遗址IE4区）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揭露出丰富的史前及夏商周等时期文化遗存，其中以商代墓地的发现最为重要。

商代墓地紧邻遗址东部的大型沟洫，所在区域原始地面被破坏严重，个别墓葬残深仅0.1米，人骨已被削去不少，推测还有一些小型墓葬因被破坏而不存。本年度共发现并清理16座墓葬，其中大型墓1座，中型墓3座，小型墓12座。所见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大部分都可见木质葬具痕迹。除1座为东西向外，其他墓葬都是南北向，墓主头向南。大型墓葬居中，其他墓葬环绕在其周围，形成有序的三排。

大型墓M16的墓坑面积约9平方米，深1.2米。墓坑开口线东侧向外凸出，整体略呈凸字形。凸出部分被东周灰坑打破，残存南半部。墓葬东、西两侧各有一个直径约0.15、残深约0.16米的柱洞，东侧者位于墓坑凸出部分，西侧者紧贴椁木板，用途尚不清楚。M16的葬具为一棺一椁。椁保存较差，仅存在残存的木质葬具灰痕。南侧椁板上摆放羊头和两条前肢，东、西棺椁之间的填土中各有一具殉人。棺的保存状态较好。在棺木朽烂之前，棺室内曾数次进水，带人的淤泥对棺木形成了支撑，可以看出其整体略呈U形。墓主骨架保存较差，仰身直肢，面朝西，初步鉴定其性别为男性。M16的随葬品皆置于棺内，种类有青铜、绿松石、玉、陶、贝、漆器等。青铜鬲、罍、爵放置在墓主足端；两件漆器位于墓主人足端西侧，靠近青铜器，其中一件为漆觚。漆觚斜上方紧贴棺侧板处，有一件玉圭，其窄边带有装饰痕迹，并且正对漆觚；青铜器和漆器附近还有陶直口缸一件、浅腹盆两件、小口鼓陶罐一件；绿松石器放置在墓主人左臂处；另一件陶深腹盆位于墓主头端东侧；在墓主颈、胸部还发现一些海贝。

中型墓3座，墓口面积大于2平方米，随葬品较丰富。如M8的墓口面积约2.2平方米，自深0.74米。葬具为一棺。墓主俯身直肢，骨架保存较差，初步鉴定其性别为男性。M8的随葬品主要置于墓主足端。青铜罍位于墓室西北，陶小口鼓陶罐在其北，铜刀在其南；铜爵位于墓主左侧股骨附近，玉梯形器紧靠铜爵放置；仿陶陶鼎在左膝处，鼎下有3铜铈。

小型墓11座，墓口面积多不大于2平方米，随葬陶器或不见随葬品，随葬品一般置于棺内。如M10的墓口面积约1.5平方米，葬具为一棺、陶鬲、盆、罐位于足端，另一件陶鬲位于头端。M23墓口面积约2平方米，葬具为一棺，随葬五件陶器，其中盆、罐、单耳鬲置于棺内，簋和另一件单耳鬲放置在北侧的二层台上。

初步将这些墓葬分为早、中、晚三段。早、晚段的时代分别相当于二里头下层一期、二期，中段的时代介于二者之间。前述M23属早段，M10属中段，M8和M16属晚段。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西吴壁墓地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518—1406年。

随葬器物的文化面貌可归属为商文化系统，但也有地方特点，此外还发现少量北方等文化因素。结合遗址中的其他发现，可知晋南同北方地区在商代初期关系密切，暗示晋南地区的铜料输出方向除商王朝中心都邑外，可能还有北方青铜文化分布区。

目前，二里头下层阶段的商系墓葬数量少，墓地更稀有。西吴壁墓地的发现，为研究商代墓葬制度的源流等学术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所见大、中型墓葬已经形成了鼎（或鬲）、罍、鬯的礼器组合，这与夏代晚期贵族墓中的礼器组合有所不同，显示出商因于夏礼，但有所损益的历史事实。出土青铜器种类丰富，与之共存的陶器时代特征明确，为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断代确立了可靠的年代标尺，将促进早期青铜器领域的学术研究。

商前期手工业者的墓葬多为南向。西吴壁商代墓地处在遗址冶铜手工业区，葬者的头向几乎皆为南向。由此可以推知，该墓地葬者生前可能从事冶铜管理与生产工作，此处墓地是商代冶铜生产管理者与工匠的墓地。

大型墓葬M16是迄今所知商代初期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高等级墓葬。其葬者应是商王朝派驻到晋南地区的高级贵族。以往我们曾据西吴壁遗址商代聚落面积大等因素，推测该遗址具有较高等级。此高等级墓葬的发现，可进一步推知西吴壁是商代前期晋南地区最重要的中心聚落之一，除向外输送铜料外，还肩负区域管理与对外交流等职能。

西吴壁墓地的葬俗主要属商人系统，但也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如俯身葬比例高，南向墓较多，随葬品和葬俗文化因素多元化等。这为研究晋南地区商代人群构成、商代礼制源流，以及商王朝在晋南地区的管理模式等学术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p>科技保护 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p>		<p>遗址 博物馆 发掘现场</p>	
<p>科学管理 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服务</p>		<p>档案馆 图书馆 旅游景区</p>	
<p>创新服务 科技文创、定位导览、数字化采集</p>		<p>官方网站 官方微信</p>	
<p>联系人：张磊 13572270596 电话：029-88346382 官网：www.microwise-system.com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p>			